

# 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的实践困境与双维互构机制

——基于“结构性嵌入与关系性调适”的分析框架

戴香智<sup>1,2</sup>

(1.贵州民族大学, 贵州 贵阳 550025; 2.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04)

**摘要:** 乡村振兴战略的纵深推进对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治理提出迫切需求, 但专业介入往往陷入与乡土社会之间的“悬浮”困境。以H省W县S村为典型案例, 构建“结构性嵌入—关系性调适”的双维互构分析框架, 系统探讨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的实践困境及其深层机理。研究发现, 困境根源在于结构性嵌入失灵与关系性调适失效的相互强化, 表现为制度错位、文化张力与信任悬浮。进而, 社会工作通过双维互构机制逐步走出困境, 其运作路径呈现为“信任积累—绩效彰显—制度认可—专业共生”的递进链条。具体而言, 即通过“串门工作法”与集体仪式激活等关系性调适策略积累村民信任, 将信任转化为可感知的服务绩效, 并经由制度化翻译争取制度认可, 最终在能力共生与权威让渡中实现专业与乡土的双向赋能, 形成结构促进关系、关系反哺结构的良性循环。这一过程系统揭示了社会工作从“项目嵌入”走向“专业共生”的微观机制, 为优化其参与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提供了理论参照与政策启示。

**关键词:** 乡村振兴; 社会工作; 结构性嵌入; 关系性调适; 双维互构

中图分类号: C912.82; D422.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26)03-0067-09

## Practical dilemmas and the dual-dimensional interaction mechanism of social work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structural embeddedness and relational adjustment

DAI Xiangzhi<sup>1,2</sup>

(1.Guizhou Minz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 China; 2.Changsha Social Work College, Changsha 410004, China)

**Abstract:** The in-depth advancement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has generated an urgent need for social work participation in rural governance. However, professional intervention often falls into a state of “suspension” within local rural society. Taking S Village in W County, H Province, as a case stud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dual-dimensional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structural embeddedness–relational adjustment” to systematically examine the practical dilemmas and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social work participation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se dilemmas stem from the mutually reinforcing failures of structural embeddedness and relational adjustment, manifested as institutional dislocation, cultural tension, and suspended trust. In response, social work gradually navigates out of these difficulties through a dual-dimensional interactive mechanism. Its operational trajectory unfolds as a progressive chain: “trust accumulation–performance demonstration–institutional recognition–professional symbiosis.” Specifically, relational adjustment strategies—such as the “door-to-door visiting method” and the activation of collective rituals—help accumulate villagers’ trust. This trust is subsequently transformed into tangible service performance, which then gains institutional recognition through institutional translation. Ultimately, through capacity symbiosis and the delegation of authority, social work and local rural society achieve mutual empowerment, forming a virtuous cycle where structures facilitate relationships, and relationships, in turn, reinforce structures. This process systematically reveals the micro-level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social work evolves from

收稿日期: 2026-02-11

基金项目: 湖南省社会科学评审委员会项目(XSP26YBZ219);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25YJA840008)

作者简介: 戴香智(1974—), 男, 湖南武冈人, 贵州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工作与社会治理。

“project-based embeddedness” to “professional symbiosis”, offering both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optimizing the pathways of social work participation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social work; structural embeddedness; relational adjustments; dual-dimensional co-construction

## 一、问题的提出

乡村振兴作为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基石,其实质在于通过系统性变革打破城乡二元结构、重构乡村治理体系。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纵深推进,乡村场域对多元专业力量的召唤日益迫切。在此进程中,社会工作凭借其“助人自助”的专业内核与“增能赋权”的实践范式,被赋予了衔接国家政策叙事与乡土实践逻辑的枢纽角色,成为参与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近年来,从《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快推动乡镇社会工作服务站建设”“加大本土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力度”<sup>[1]</sup>,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培育社会工作人才”“搭建社会工作和乡村建设志愿服务平台”<sup>[2]</sup>,再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报告进一步强调“健全社会工作体制机制”<sup>[3]</sup>等,这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为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然而,由于制度适配不足、文化融入困难等现实挑战,当社会工作嵌入乡村振兴的复杂情境时,往往陷入专业介入与乡村真实需求之间的“悬浮”困境。究其根源,既有正式制度层面的结构脱嵌,更有植根于乡土社会非正式机制层面的文化拒斥,因此,迫切要求对社会工作参与路径进行系统的反思与重构。

社会工作如何有效参与乡村振兴这一议题已经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并积累了较丰富的成果。其中嵌入性理论作为核心分析工具,已经成为相当部分研究的分析起点。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关于制度嵌入方面的研究。该取向深受新制度主义等影响,侧重于探讨社会工作者作为外部专业力量,如何与既有的乡村行政体制和制度环境实现衔接。在理论层面,王思斌开创性地提出并系统阐述了社会工作的“嵌入性”发展理论<sup>[4]</sup>,为后续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王进等试图构建宏观的制度框架,强调制度、关系与功能的三重路径整合<sup>[5]</sup>;叶林等揭示了社会力量与乡村基层政权的

制度性耦合<sup>[6]</sup>。但该取向的研究在展示结构性嵌入可能性的基础上,也指出了过度依赖外部嵌入可能消解乡村文化主体性<sup>[7]</sup>、导致体制嵌入受阻和服务嵌入空间不足<sup>[8]</sup>等结构性困境。

二是关于文化嵌入取向的研究。较之于结构性的制度取向,文化嵌入方面的研究更侧重乡村社会的“软约束”,诸如“差序格局”理论深刻揭示了以血缘、地缘为核心的非正式规则在传统乡村中的运行逻辑<sup>[9]</sup>,即便在现代性制度深度嵌入的今天,“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共生并存”<sup>[10]</sup>已成为中国国家治理的一个关键特征,强调了乡村文化等非正式机制在乡村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该取向的分析重点通常在价值层面的认同与张力,大多研究表现为对社会工作如何融入乡村文化的深度关切,诸如主张通过“三结合”<sup>[11]</sup>,实现专业服务与本土情境的有机融合。

三是关于动态调适取向的研究。制度嵌入和文化嵌入分别侧重于结构与文化层面,而该取向研究更关注行动者之间的动态调适过程,通常将乡村振兴视为由政府、社会、村民等行动者构成的复杂网络。诸如“嵌入—回应”机制<sup>[12]</sup>试图建立一种双向互动的模型,“情境嵌入”理论<sup>[13]</sup>则进一步强调了实践过程的动态性与匹配度,至于政党、国家与社会三元互动实现公共性再生产<sup>[14]</sup>的研究,则更直接指向了主体间关系的激活与重构,可见其分析重点主要关注互动层面的调适。

纵观以往文献,制度嵌入、文化嵌入与动态调适等取向的研究从不同维度揭示了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的复杂图景,为本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然而,现有成果或聚焦制度层面的结构性嵌入,或侧重文化层面的价值认同,或关注行动者间的动态调适等单维或静态分析,鲜有将其纳入某个统一的理论框架去审视其互动关系。对于结构性嵌入如何为关系性调适创造空间、关系性调适积累的社会资本又如何反作用于结构性嵌入及其在实践中如何动态互构等核心问题,现有研究缺乏系统阐释。同时,现有研究对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的实践困境

剖析与路径构建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困境诊断未能有效转化为路径设计的依据,路径构建也缺乏扎实的田野经验支撑。基于此,本研究拟构建“结构性嵌入—关系性调适”分析框架,以H省W县S村为典型案例进行跟踪调查,试图从实践中归纳出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的双维互构机制,以期为更有效地推动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提供参考。

## 二、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社会工作有效参与乡村振兴是一个系统工程,要破解上文谈及的难题,亟须兼具结构分析与过程解释的理论工具。嵌入理论为此提供了重要思想基础。然而,嵌入理论侧重于对嵌入状态的静态描述,难以充分揭示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的动态实践。基于此,本研究借助“结构性嵌入”与“关系性调适”概念,结合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的实践,构建“结构性嵌入—关系性调适”双维互构分析框架。

### (一) 嵌入理论及其局限

嵌入理论最早由波兰尼提出,强调经济活动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嵌入社会结构、文化规范与政治制度之中<sup>[5]</sup>。格兰诺维特则将嵌入理论往前推进了一大步,提出了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两种途径<sup>[6]</sup>。王思斌将嵌入理论运用于社会工作领域研究,提出“嵌入性”是中国社会工作的重要特征<sup>[4]</sup>;朱健刚等指出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实践本质上是“嵌入性发展”<sup>[7]</sup>。这些研究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然而,格兰诺维特对结构嵌入与关系嵌入富有洞见的区分,本质上是对嵌入状态的类型学描述,即对行动者所处社会网络与制度环境等方面的关注。但是,这一区分更侧重于静态分析,未能充分关注嵌入主体改变结构的动态过程。事实上,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并非被动地置身于既有结构或关系之中,而是在具体情境中不断与制度、文化、行动者互动协商的能动实践过程。因此,需要结合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的实践,超越对嵌入状态的静态描述,转向对嵌入过程的动态分析。

### (二) 结构性嵌入的三个维度

结构性嵌入是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的基础性条件。本研究将这一概念从既定的静态制度空间拓展到社会工作领域,主要从政策、组织与资源三个维度展开分析。

一是政策嵌入。政策嵌入为结构性嵌入奠定制

度合法性基础,即指社会工作通过契合党和政府有关乡村振兴的政策从而获得制度合法性。从“十四五”规划提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sup>[18]</sup>,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要求各级人民政府鼓励和支持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社会工作不仅实现了嵌入乡村振兴的合法性构建,而且通过政策赋权促进了其从政策文本到治理效能的实践转化。同时,社会工作作为赋能人民的学科<sup>[19]</sup>,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sup>[20]</sup>,与乡村振兴保持了较好的同频共振。

二是组织嵌入。组织嵌入可推动社会工作融入多元协同治理结构,即社会工作确立其参与乡村振兴的角色定位及融入乡村社会多元协同治理结构的过程。该实践过程通常又可分为政府主导型嵌入和社会协同型嵌入等类型。前者通过乡镇社会工作站与基层政府、村“两委”建立制度化协作关系;后者则形成“社会工作者+合作社+村民”协同网络。无论是政府主导型,还是社会协同型,社会工作通过组织嵌入,都可在参与乡村振兴事业中扮演“政策执行者”“村民利益代言人”“资源整合者”等枢纽角色。

三是资源嵌入。资源嵌入保障社会工作内生发展转型,即社会工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社会捐赠等渠道获取物质保障,这是实现其服务可持续性与专业自主性的前提。资源不仅包括财政资金,还涉及人力资源、信息资源、社会资本等要素。实践中,社会工作要承担资源链接者角色,搭建村民自主互助网络,链接外部资源,对接电商平台,并进行多元主体的利益协调。

上述三个维度构成了结构性嵌入的主要元素,实践中,三者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政策嵌入为组织嵌入提供合法性前提,组织嵌入为资源嵌入提供结构载体,而资源嵌入的成效又会反过来验证政策嵌入的有效性。三者共同构成了社会工作能动建构动态场域的具体路径。

### (三) 关系性调适的三个维度

关系性调适指社会工作在多元主体互动中主动融入乡村文化场域,实现专业方法与乡土逻辑的调适,是获得村民认同、有效参与乡村振兴的关键路径。本研究将其与经典理论中相对静态的“关系嵌入”相区分,强调它是社会工作主体在乡土场域中主动进行的“文化翻译”、网络重构等能动实践。

该概念涵盖文化认知、社会网络与实践方法三个维度,旨在激活、改造乃至再造乡土社会关系。

一是文化认知层面的调适。文化认知层面的调适为关系性调适奠定价值认同基础,即在尊重乡土文化的基础上,社会工作通过“文化翻译”实现专业理念与本土文化融合。社会工作通过田野调查,系统整理乡村口述史、传统技艺等,将其制作成可传播的知识体系,这样,不仅可以促进乡村文化的再生产,而且也是对乡村文化的尊重与创新性保护。

二是社会网络层面的调适。社会网络层面的调适为关系性调适提供关系承载空间。这是社会工作参与修复并重构乡村社会资本的过程,其中不仅要激活血缘、地缘关系网络,调动乡贤等传统力量进行适应性改变,而且要积极推进培育合作社、村民议事会等新型社会组织,构建起传统与现代社会资本共生的支持网络体系。

三是实践方法层面的调适。它为关系性调适提供操作化路径,将专业方法与乡村语境的实践智慧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具有乡土亲和力的工作范式。社会工作将个案工作与“串门”、小组工作与“屋场会”、社区工作与“祠堂议事”等有机结合,既带入了专业逻辑,又契合了乡村居民互动的惯习,有力地促进了专业方法的转译。

在关系性调适的上述三个维度中,文化认知为社会网络提供价值导向,社会网络为实践方法提供关系支撑,实践方法反过来又可以验证和深化文化认知。三者共同构成了社会工作激活、改造乃至再造乡土社会关系的具体路径。

综上所述,结构性嵌入与关系性调适并非制度结构与乡土实践的简单叠加,而是持续互动、彼此渗透的辩证发展过程。结构性嵌入通过制度安排、资源配置为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提供合法性基础与行动空间,关系性调适则为制度落地提供情感认同与社会土壤。二者在实践中相互转化、动态互塑,共同构成社会工作深度嵌入的核心逻辑,推动社会工作从“项目嵌入”走向“专业共生”,彼此赋能、双向再造,以有效形成共同治理的状态。当然,两者的具体互构机制——结构性嵌入如何为关系性调适创造空间,关系性调适积累的社会资本又如何反作用于结构性嵌入,彼此在实践中需要怎样的转化条件——有待在后续的案例研究中进一步观察、检验与归纳。

### 三、案例背景与研究方法

H省W县S村是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村,2017年由三个行政村合并而成,距县城约50公里。山林面积2000余公顷,其中楠竹约占90%,是当地传统特色资源。全村户籍人口2800余人,常住人口不足1500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30%,40岁以下青壮年劳动力中超过70%长年在外务工,呈现明显的“空心化”趋势,是当前中西部山区农村的典型缩影。

S村存在以刘、张、李三大姓为主的宗族长老和返乡经济能人构成的非正式权力结构,其在村庄事务中具有较高话语权。由于人口外流、结构老化、传统仪式淡化等,人们对村庄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持续下降,集体行动难以达成,甚至春节等传统节日返乡的村民也逐年减少。留守老人不仅要独自承担农业生产劳动,还需承担隔代抚养孙辈的责任。留守儿童约70人,大多是隔代监护,祖辈基本是照顾孩子的生活起居,缺乏学业辅导和心理疏导能力。年轻女性早年也大多外出务工,但近年来留守妇女增多,其普遍面临“想做事没门路、想增收没技术”的困境,也有部分人“没事做,就打打牌”。人口结构的变化直接带来了S村“有地无人种、有事无人议、有需无人应”的治理窘境,村内传统社会网络较松弛,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积极性不高。村民主要以出售原竹和竹笋为生,传统楠竹资源因缺乏深加工能力和市场渠道,长期处于低附加值状态。村民收入微薄,面临守着资源难致富的困境。

2023年,某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以下简称“G机构”)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进驻S村,项目周期一年,经费6万元;在项目实施期间,作为项目承接方的G机构需要完成20场社区活动、培育2个社会组织、服务400人次等量化指标。同时,该机构需派驻2人负责该项目,其中1名专职社会工作者常驻开展乡村振兴社会工作服务。这种“项目制+量化考核”的购买服务模式在全国具有普遍性,但其简单套用城市服务模式的做法,忽视了村庄“空心化”背景下的真实需求,为后续的嵌入困境埋下了伏笔。

选取S村作为典型案例主要基于如下考量:一方面,S村作为中部山区“空心化”村落的典型代表,其面临的人口结构失衡、产业基础薄弱、社会资本流失等问题具有广泛共性;另一方面,该村社会工作项目从“指标竞赛”到“深度扎根”的转型,

完整呈现了社会工作机构从“进场悬浮”到“深度互构”的实践转型,适合进行过程追踪与机制归纳,为观察双维互构的运作机理与限度提供了理想的田野观察点。

本研究采用探索性单案例研究方法,有助于深入揭示动态过程的微观机制,适合回答“如何”与“为什么”类型的研究问题。数据资料收集历时两年,期间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式观察,笔者利用节假日多次深入S村,跟随驻村社工入户走访、参与社区活动、观察日常互动;深度访谈,即对社会工作者、村干部、村民、本土协作者等进行半结构化访谈;文件档案分析,即收集项目合同、工作报告、活动记录、村民反馈等资料。

#### 四、社会工作嵌入S村的实践与困境

G机构在进驻S村初期,由于对乡村空心化、宗族网络等异质性特征认知不足,社会工作嵌入遭遇了嵌入失灵与调适失效的多重困境。具体表现为结构性错位、文化张力与信任悬浮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这些困境相互交织、彼此强化,致使社会工作嵌入面临着比较严峻的挑战。

##### (一) 嵌入的结构性错位

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在实践中往往简单套用城市模式,忽视了乡村空心化、宗族网络复杂等异质性特征,使得标准化行政制度供给与乡村社会的差异化需求之间产生结构性张力。S村社会工作项目合同有具体的量化指标,举办活动和服务频次需提交活动记录、签到表等痕迹材料。在考核压力下,社会工作者被迫将大量精力投入材料撰写,入户走访只能见缝插针地进行。一位社会工作者在日记中写道:“组织活动、拍照、签到,忙了一下午,但根本没时间跟留守的孩子们聊聊天,感觉自己像个‘活动贩子’而不是社会工作者。”也有村民直言:“他们就是来搞活动的,拍完照就走。”社会工作者尚未真正入场,已被贴上“临时工”“形式主义”等标签。

这种量化指标与深度陪伴需求的结构性错位,使社会工作服务从专业赋能工具逐渐被异化为行政延伸手段,社会工作因“行政事务缠身”<sup>[20]</sup>而陷入“去专业化”困境。同时,乡村振兴多维主体对社会工作的专业角色认知模糊,导致社会工作者难以获得实质话语权,“难以融入社区”“服务项目

难落地”<sup>[21,22]</sup>的实质是行政逻辑对专业逻辑的制度性排斥。这一困境不仅固化了专业力量参与乡村振兴的边缘化地位,更从制度根源上削弱了社会工作通过结构性嵌入获得合法性的可能。

##### (二) 互动的文化张力

社会工作倡导的性别平等、个体权利等现代价值理念,与传统乡土社会“男尊女卑”“长者权威”等传统礼俗之间存在本质差异,构成对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实践的隐性排斥。S村的项目方案设计了妇女议事会板块,旨在赋权妇女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社会工作者提前一周张贴通知、设置议程,期待一场平等开放的民主协商。然而,在议事会召开当天仅有5位妇女到场,其中3位还是村干部家属。正如一位妇女私下坦言:“村里的事由男人和村干部管,女人掺和人家会说她出风头。”这一场景生动呈现了专业平等理念与乡土社会传统礼俗之间的文化张力,有村民甚至认为“社会工作站推动议事会是挑战传统权威”而指责社会工作“坏了规矩”。

驻村两个月,社会工作者张某感觉到“始终被村民视为外人”,入户走访时“村民客气倒茶却不愿深谈”,组织活动时参与者寥寥。张某试图开展深度访谈,但村民对其提问感到不自在,认为“跟审犯人一样”。一位老农私下认为“这些娃娃心是好的,但坐不到一条板凳上”。社会工作理性化的专业工具被村民视为对人情关系网络的生硬切割,专业介入方案遭遇水土不服。理性化专业工具与乡土人情关系网络之间存在的文化张力,在S村得到充分显现,使社会工作在乡村治理及日常生活中难以发挥专业作用,陷入合法性与有效性双重危机。

##### (三) 信任缺失导致关系悬浮

信任是社会工作深度嵌入乡村的社会基础,但S村社会工作在驻村初期因信任缺失陷入关系悬浮。一方面,村民对社会工作的角色认知较为陌生和模糊,社会工作站落地乡村时,村民会将社会工作者视为“政府派来的临时工”,这种认知偏差阻碍了专业信任的建立。如社会工作者在S村倡导成立竹笋栽培合作社的初期,村民们无论能力强弱,都表现出较强的排斥或观望倾向。另一方面,乡村空心化趋势导致传统互助网络弱化,而社会工作倡导的志愿互助尚未形成新的社会资本,使其参与乡村振兴的信任构建缺乏社会基础。同时,社会工作的部分实践简单套用城市服务模式,忽视乡村内生文化的

特殊性,导致项目设计脱离村民真实需求。

更值得关注的是,乡村振兴实践场域中存在的宗族长老、经济能人等非正式权力结构,可能形成资源截留效应,从而挤压困难群体的服务覆盖范围,导致真正需要帮助者被边缘化。同时,社会工作专业方法若脱离地方性知识脉络,便难以融入村民的日常认知图式,使自身陷于“临时帮扶”的认知窠臼,社会认同度较低,融入进程屡屡受阻。多重困境相互强化,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的“悬浮”状态,使其难以实现从进驻乡村到融合发展的实质性突破。

总之,S村社会工作结构性嵌入失灵与关系性调适失效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缠绕、彼此强化,形成难以破解的实践僵局。一方面,考核短视迫使社会工作者将时间用于“做材料”而非深度互动,指标竞赛的异化实践催生村民对形式主义的负面认知,使乡村传统的关系性调适渐失群众基础。另一方面,关系性调适失效导致村民认同不足,削弱基层政府对社会工作效能的认可,进而影响政策支持的持续性与资源投入的稳定性。这样,前者挤压后者所需的信任空间,后者侵蚀前者的社会根基。两者相互作用,最终使社会工作停留于表层服务项目的参与和简单数字评价层面的形式化状态,难以实现对乡村振兴事业的深度嵌入。

## 五、双维互构机制的形成与运作

S村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的实践过程,揭示了其结构性嵌入失灵与关系性调适失效及其相互强化的僵局。在此基础上,G机构团队调整策略,创造性地运用双维互构逻辑,在结构性嵌入与关系性调适两个维度上协同发力,形成了行之有效的双维互构机制,逐步走出悬浮困境。

### (一) 关系性调适的信任积累与文化激活

信任积累与文化激活是乡村社会关系性调适的重要基础。针对驻村初期暴露的社会资本流散与信任困境以及专业平等理念与乡村礼俗的文化冲突,社会工作者在S村摒弃了简单的城市服务移植逻辑,转而在日常互动中积蓄信任、在集体仪式中激活文化认同,从以下几个层面展开关系性调适。

一是在串门中识别需求,积累日常互动中的信任。在初入村庄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坚持运用传统的个案调查、结构式入户访问等方法,了解村民需

求及当地风土人情等,以期更好地服务。但村民似乎“不买账”,不太接受,甚至不欢迎社会工作者的介入。面对入户走访遇冷的局面,社会工作者及时调整策略,将大量时间用于“串门”,拉家常、听诉求。例如,社会工作者张某得知村民李某想提高冬笋产量却缺乏资金和技术,便主动牵线种植大户提供指导,并以个人信誉担保赊购肥料。获得丰收后,李某主动表示“以后村里有事尽管叫我”。社会工作者将这种实践提炼为“串门工作法”,即在串门中识别需求、链接资源、建立信任。

二是利用“六月六尝新节”,激活集体仪式的文化认同。在集体仪式层面,社会工作者张某协助S村恢复已淡化的“六月六尝新节”,邀请长者讲述习俗、老篾匠展示竹编技艺,外出务工村民专程赶回村庄,并感慨“这才是我们的村子”。通过这些活动,张某完成了从“政府临时工”到“自己人”的身份转换,村民对其称呼从“那个大学生”逐渐变为“小张”。日常互动的情感积累与集体仪式的文化认同相互强化,共同筑牢了关系性调适的社会根基。

S村经验揭示了关系性调适有效运作的实践条件:社会工作能否深度嵌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对关键节点的敏感度。社会工作者张某正是及时捕捉到村民对冬笋种植技术及资金的需求,并将“串门”这一日常活动转化为专业介入的依托,才避免了后续转化的延后。这表明,社会工作需具备将日常互动主动转化为专业关系的能力,而非被动等待关键节点的自发出现。

### (二) 结构性嵌入的绩效彰显与制度协商

绩效彰显与制度协商是结构性嵌入取得突破的关键环节。面对量化指标与深度陪伴的结构性错位等困境,S村社会工作通过系统呈现服务成效、持续开展制度协商,逐步争取到弹性政策空间与制度认可。

社会工作团队利用两个月时间,系统梳理了S村的资源禀赋、人口结构及真实需求,形成了《S村需求评估与项目优化报告》。该报告以数据和案例为依据,清晰呈现出原购买服务方案中“20场活动、400人次服务”的量化要求与村民真实需求之间的结构性错位。为了将这种错位转化为可被理解的专业表达,报告完整记录了“冬笋事件”“六月六尝新节”等典型案例,用社会工作者“能做事”“会做事”的事实展现了专业能力。在此基础上,

团队进一步提出了可供购买方权衡的具体替代方案：将项目周期延长至两年，并将30%的项目资金转为村居公益金，由村民议事会共同决策使用方向。这一做法不仅揭示了问题，更提供了解决路径，为后续的制度协商奠定了基础。

基于上述报告与替代方案，社会工作团队开启了持续的制度协商。据社会工作者反映，促成项目购买方同意延长项目周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三次正式汇报、两次现场走访以及多次非正式沟通等。最终说服对方的，不是简单地“抱怨式说理”，而是通过报告中传递的专业诚意，即“若按照原指标执行，确实能够保证活动数量，但可能影响服务质量；但若能给予一定的弹性空间，本项目团队可以在项目期间内做出一个真正扎根的样本”。经多次协商，服务购买部门同意了社会工作团队提出的替代方案，并在项目成效评估指标中增设村民满意度等质性指标。这一突破不仅为社会工作深度嵌入争取了制度弹性空间，而且也体现了以专业诚意换取购买方弹性让步的“共赢”逻辑。

S村的案例表明，社会工作所积累的信任与服务成效，必须被“翻译”为项目购买方能够识别和理解的数据和案例，并通过持续沟通，逐步转化为制度层面可接受的选项。这一机制的生效，不仅要求社会工作者具备将日常互动中的信任积累转化为可展示绩效的能力，还要求制度环境为购买方保留愿意接受协商与调整的弹性空间，更要求其在沟通过程中始终保持专业诚意与策略耐心。唯有如此，关系性调适的成果才能突破结构性约束，最终实现从“村民信任”到“制度认可”的跨越。

### （三）双维互构的能力共生与权威让渡

能力共生与权威让渡是双维互构走向固化的核心机制。针对上文所呈现的地方性知识脱嵌与非正式权力结构中的实践悬浮等问题，社会工作通过着力培育本土协作者、让渡专业权威等路径，实现专业性与本土性的双向赋能。

一是本土协作者的发现与培育。在日常深耕与仪式激活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张某发现S村退休教师老周、返乡青年小刘、妇女骨干李大姐等有热情、有威信，便开始有意识地培育其成为协作者，邀请他们参与活动策划，在共同工作中传授社区动员方法。这一过程蕴含了赋能式支持的理念，其初衷是让本地人才在“前台”唱戏，为社会工作践行

“助人自助”理念提供支持。遇到矛盾时，社会工作者退到二线，让村民看到“自己人”在调解，张某只适当提供专业建议。这种“发现—赋能—退后”的培育策略，为后续的能力共生奠定了基础。

二是“赋能式支持”的实践探索。培育项目始于“六月六尝新节”筹备。社会工作者张某邀请老周、小刘、李大姐分别负责仪式设计、物资筹备与妇女骨干动员。这一安排蕴含了精妙的“权威让渡”策略，也符合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价值理念，但项目推进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退休教师老周平时比较容易接受新事物，但初期对社会工作专业方法持保留态度。张某坚持以“不争辩、先做事”回应，支持老周以自己的方式推进，仅在遇到困难时才尝试性建议“要不要试用新的方式”，以在行动中证明专业价值的方式比口头说服更有效。其中真正考验是一次纠纷调解中，老周以传统说教式方式调解未果后求助张某。张某并未直接介入，而是与其复盘分析“为什么没有调解成功”，再引导其思考“是否还有其他角度可切入”，最后建议“借用‘差序格局’理论，是否可邀请德高望重的长者、当事人远在外地务工的子女、其他亲戚等参与”。这种“赋能式支持”既保留了老周的“面子”，又让其在实践中接受并内化了专业方法。

三是能力共生的机制提炼。经过一年时间的磨合，老周等本土协作者已能独立利用社工理念、方法与技巧组织活动、协调纠纷，村民态度也从“小张是好人但毕竟是外人”转变为“老周他们出面信得过”。这一转变的核心在于：社会工作者通过“退后一步”让渡专业权威，通过“赋能式支持”传递能力，最终实现了专业性本土性双向赋能，基于“外引内培”策略的专业属性与本土力量在共同行动中“相互滋养”。这样，既保留了村庄的情感信任，又注入了专业的技术理性，进而使本土协作者成为具备本地智慧的合作者。当然，该模式本身也存在后续张力，当本土协作者成长为准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后，原有的“专业—本土”关系需要重新协商，否则又将产生新的张力。

### （四）双维互构的整合框架

双维互构是本研究基于案例探究的逻辑收束与理论凝练。基于前文对S村案例结构性嵌入和关系性调适等的分析，笔者发现二者并非简单并列，而是通过信任积累、绩效彰显、制度认可等环节，

在实践中相互转化、动态互塑,从多重困境走向良性循环,最终指向“专业共生”的理想图景。

一是信任积累、绩效彰显与制度认可的递进转化。初始阶段,关系性调适往往体现为信任积累,当社会工作者与村民之间的信任通过诸如帮助其解决具体问题等关键节点,转化为“可感知绩效”时,便具备向制度等结构性因素渗透的能力。实践中不断积累的信任与彰显的绩效若能被基层政府“看见”并认可,则可通过正式汇报、媒体推介等渠道争取政策倾斜,实现从“村民信任”到“政府认可”的跨越。最终,获得制度认可后,社会工作者的行动空间得以拓展,为进一步深化关系性调适、培育本土协作者创造了新的结构性条件,使关系网络从“社会工作者—村民”的简单互动进化为“社会工作者+协作者—村民”的深层嵌套。

二是形成“专业共生”的实现机制。这一递进转换机制,有效打破了上文所呈现的持续困境,代之以“结构促进关系—关系反哺结构”的良性循环。从信任积累到绩效彰显,再到制度认可与赋能,这一过程揭示了双维互构从抽象概念转化为实践过程的微观机制,使得结构性嵌入与关系性调适之间得以克服张力,形成“结构促进关系—关系反哺结构”的良性循环,推动社会工作不断超越表层的“项目进村”,实现从外在嵌入到内在融合的升华,最终走向“专业共生”。

## 六、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S村案例的深入剖析,本研究揭示了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的实践困境与双维互构的运作机制。基于上述田野资料与理论归纳,在得出主要结论的同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并反思研究局限与展望未来方向。

### (一) 主要结论

本研究以H省W县S村为案例,构建“结构性嵌入—关系性调适”的双维互构分析框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的困境根源在于结构性嵌入与关系性调适的双重失灵,二者相互强化,导致实践悬浮与形式化。从困境走向良性互构的转化路径为“信任积累—绩效彰显—制度认可”的递进链条:以关系性调适积累信任,以可感知绩效赢得政府认可,进而获取制度弹性空间,形成结构促进关系、关系反哺结构的良性循环。“专业共

生”是理想图景,其实现需社会工作具备关键节点敏感度,制度环境保有弹性空间,并实现双向赋能与权威让渡,在制度现代性与乡土传统性之间走出一条可持续的融合通道。

### (二) 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发现,本研究归纳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是营造绩效确权与双向评估的制度环境。面对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指标竞赛”“去专业化”以及“临时工”标签与信任缺失困境,改革以量化指标为主的考核方式,将村民满意度作为核心考核指标,增设村民参与度、社区资本积累率等质性指标,引入第三方评估,建立服务项目动态退出与熔断机制。这一方向与“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健全社会工作体制机制”<sup>[23]</sup>高度契合。同时,建立社会工作机构对基层行政配合度的反向评估机制,将其结果纳入购买服务的信用记录;在项目合同中也可明确约定,当专业判断与行政指令冲突时,社会工作机构有权启动“专业保留程序”,向主管部门申诉。这种制度化的博弈空间,可将“关系信任”转化为制度化的“专业信任”,扭转社会工作者“临时工”的弱势地位。此外,还可以积极推动从“政策赋权”向“绩效确权”转型,引导社会工作机构以可见、可测的发展成效向基层政府证明其专业价值,为专业共生奠定绩效基础。

二是优化购买服务机制的弹性化设计。鉴于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中普遍存在嵌入的结构性错位困境,即标准化行政供给与乡村差异化需求之间的结构性张力,以及量化指标对专业关系构建的挤压,可探索构建“基础服务包+特色项目”复合购买机制,积极推进基础服务包聚焦弱势群体关爱、政策宣传等乡村振兴领域的刚性需求,确保基本服务全覆盖;特色项目则要预留一定的弹性空间,允许社会工作者根据村庄的实际情况自主设计服务内容及其推进方案。这样,可使社会工作者从“做材料”转向“做服务”,从“完成任务”转向“扎根村庄”,为社会工作深度嵌入争取制度空间。

三是构建专业社会工作者与本土协作者的双轨人才体系。针对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中普遍存在的信任缺失导致关系悬浮、地方性知识脱嵌等困境,通过“外引内培”双轨策略构建人才支撑体系。其中,外来专业社会工作者发挥技术赋能与资源链接功能,承担“政策翻译员”角色,将专业理论与

方法置于乡村语境中重新诠释；本土协作者依托地缘、语言等优势承担“文化翻译”与关系维系功能，成为带着本地智慧与社会工作者共同探索解决方案的“合作者”。同时，将本土协作者培养成效纳入项目考核体系，使社会工作机构有动力投入长期人才培养，而非仅关注短期指标。这一渐进式培育策略，既保留了乡土社会的情感信任内核，又注入了专业组织的技术理性，实现专业性与本土性的双向赋能。

四是推动关系性调适成果向制度规范转化。基于前文揭示的机制提炼的在地绩效制度化翻译逻辑，宜将专业的个案工作与“串门工作法”、小组工作与“屋场会”、社区工作与“祠堂议事”相结合，形成具有乡土亲和力的工作范式，使在地调适经验上升为可复制的服务标准规范与操作指南。同时，可将非正式的调适经验纳入基层治理制度化框架，使零散的在地智慧沉淀为可传承的制度资产，从根源上避免双维关系长期处于“两张皮”状态。这一转化既保留了乡土“互惠理性”的内核，又融入了社会工作专业元素，为专业共生提供制度支持。

### （三）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采用单案例深描方法，虽能深入揭示双维互构等动态过程及其机理，但结论的普适性有待多案例验证。S村作为中部山区的典型空心化村落，其经验在其他地区的适用性尚需进一步检验。后续可从跨区域比较、量化测量等方面，检验双维互构在不同乡村的适用性及边界条件，还可以通过长期追踪深入研究，观察专业共生状态的演变过程，亦可进一步探索本土协作者成长起来后“专业—本土”关系发展对能力共生的动态调适机制。

### 参考文献：

- [1] 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EB/OL](2021-02-23)[2025-07-18].[https://www.gov.cn/zhengce/2021-02/23/content\\_5588496.htm](https://www.gov.cn/zhengce/2021-02/23/content_5588496.htm).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EB/OL](2021-04-29)[2025-06-08].[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1-04/29/c\\_1127393923.htm](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1-04/29/c_1127393923.htm).
- [3]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EB/OL].(2024-07-21)[2025-07-18].[http://www.scio.gov.cn/zdggz/jj/202407/t20240722\\_855895.html](http://www.scio.gov.cn/zdggz/jj/202407/t20240722_855895.html).
- [4] 王思斌. 中国社会工作的嵌入性发展[J]. 社会科学战线, 2011(2): 206-222.
- [5] 王进, 赵秋倩. 合作社嵌入乡村社会治理的模式与动力问题研究[J]. 理论导刊, 2016(6): 63-66.

- [6] 叶林, 雷俊华. 社会力量助推乡村振兴的内源性发展路径研究[J]. 理论与改革, 2022(1): 87-101.
- [7] 金栋昌, 陈怀平. 乡村文化振兴的方法论审视[J].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2024(1): 84-95.
- [8] 汪鸿波, 费梅苹.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社会工作的实践反思及分层互嵌[J]. 甘肃社会科学, 2019(1): 179-185.
- [9]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 [10] 周雪光. 寻找中国国家治理的历史线索[J]. 中国社会科学, 2019(1): 90-100.
- [11] 何雪松, 覃可可. 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的目标与定位: 以城乡社会学为视角[J]. 西北民族研究, 2021(3): 163-172.
- [12] 魏晨, 郑永君. 乡村组织振兴的“嵌入—回应”机制分析[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4): 130-140.
- [13] 范雅娜. 情境嵌合: 乡村振兴过程中农村社会工作的价值实现路径[J]. 探索, 2022(6): 120-133.
- [14] 吴高辉, 郝金彬. 耦合调适: 乡村振兴中党建引领社会共治的实践路径与内在机理[J]. 中国行政管理, 2022(09): 97-107.
- [15] 卡尔·波兰尼. 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 冯刚, 刘阳, 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 [16] Granovetter, Mark.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5, 91(3): 481-510.
- [17] 朱健刚, 陈安娜. 嵌入中的专业社会工作与街区权力关系——对一个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个案分析[J]. 社会学研究, 2013(1): 43-64.
- [1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EB/OL].(2021-03-13)[2025-02-10].[https://www.gov.cn/xinwen/2021-03/13/content\\_5592681.htm](https://www.gov.cn/xinwen/2021-03/13/content_5592681.htm).
- [19] 李迎生. 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与社会工作新发展格局[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24(2): 5-15.
- [20] 丁元竹. 健全社会工作体制机制: 历史、理论内涵与发展路径[J].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24(5): 116-128.
- [21] 武静, 周俊. 合法性视角下社会组织“进社区”的耦合策略分析——以上海市L机构为例[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3): 284-290.
- [22] 黄晓春.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实践逻辑与制度效应[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7(4): 61-66.
- [23] 国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EB/OL].(2026-03-13)[2026-03-21].[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603/content\\_7062633.htm](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603/content_7062633.htm).

责任编辑：曾凡盛